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八一三事变



## 八一三事变

“八一三”事变，又称“八一三”淞沪抗战，是抗日战争初期继“七·七”事变以后，1937年8月13日上海军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壮烈战斗。在为时3个月的战争中，上海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表现出空前的勇敢、团结、爱国和自我牺牲精神，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阻遏了日本侵略者企图迅速亡我河山的战略部署，同时也狠狠打击了汉奸投降派的“亡国论”，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并促使国民党最高当局转向抗日。“八一三”淞沪抗战揭开了抗战史上的新一页，对于持久抗战并最后夺取抗战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正式爆发了。由于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南京战略地位特殊，日本侵略军早已将速战速决占领上海列入了它的侵略计划之中，华东地区成为中日战争的主战场已经势不可挡地成为了现实。

战前上海的战略地位，可从各个角度进行透视。从政治上看，上海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发祥地，又是首都南京的屏障，从经济上看，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金融中心、贸易港口，这里的江浙财团是国民政府的钱袋；从外交上看，上海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这时租界林立，英美等国对华投资的76%在上海；从军事上看，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军港，是进入江浙地区的海上门户，又是溯长江进入中国内地的水路咽喉；从交通地理上看，这里的地势平坦，河渠纵横，沪宁、沪杭铁路交汇于此，加上优良的上海港，使之成为当时一大交通枢纽。上海如此的重要，但因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签定的《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地区驻扎和设防，只有少量警察和保安部队担任守备。事实上，上海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与此相反，日本却利用这一协定，在上海虹口等地派驻重兵，修筑坚固工事，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军舰常年在上海、黄浦江上沿岸耀武扬威地巡逻，他们不断制造事端，企图寻机出兵占领上海，进而控制全国，时至“芦沟桥事变”爆发后，这种狼子野心便暴露无遗了。

日本侵略者的进犯是蓄谋已久的，他们在《昭和12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早已标明，在长江下游地区作战时从长江下游和杭州湾登陆，同时向南京进攻，占领上海、南京、杭州的三角地带，7月中下旬起，在上海的日军已剑拔弩张，战争气氛弥漫于淞沪之滨了。日军的骄横跋扈，借机寻衅闹事可从下列大事记中窥见一斑：

7月中旬，正在台湾海峡进行演习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在司令长谷川清的率领下返回上海。

7月20日，日军蛮横地要求中国飞机停止在上海飞行。

7月24日，日军宣称其水兵宫崎贞雄“被绑失踪”。3天后，这个失踪的士兵被送回上海，原来他因去日军指定以外的妓院嫖妓，被同伙发现，怕受处分而潜逃。而日军不顾这一事实，出动陆战队在北四川路一带布岗设哨，搜查行人。

7月28日，日本海军武官本田面见中国外交部官员，海军辅助官冲野会见上海保安总团负责人，指责中方违反停战协定，声称要采取适当行动。同时，汉口日侨和部分陆战队士兵到达上海。当晚，东京命令长谷川清“保护”

日本在华中、华南的利益。

7 月中下旬，日本领事馆情报处出钱委托租界工部局调查我驻上海的军营防地及人数、军官姓名和武器名称等。

8 月初，在沪日本陆战队和在乡军人人数已达 6600 人。

8 月 6 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与武官本田、冲野又向上海市府表示中方保安队“违反协定威信及刺激日方”，并威胁说，“如不设法，恐两方情绪紧张，必激成事变”。

8 月 8 日，长谷川清又电请东京速召 600 名工人来上海，赶筑飞机场。与此同进，日本方面加紧疏散侨民，增兵增舰，空军飞机低空挑衅飞行。接着，就在第 2 天，标志“八一三”事变序幕的虹桥事件爆发了！

## 二、虹桥事件：“八一三”事变爆发了

1937年8月9日下午5时半，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驾车并携带武器，意图冲入上海虹桥中国军用机场，机场的中国卫兵进行劝阻非但无效，反招日人的开枪射击。因为中国军警当局发现近日常有日人窥探机场的举动，为了避免发生冲突，曾严令中方卫兵如遇少数日人滋扰，不得开枪还击。所以当大山和斋藤向中方开枪时，中方卫兵只是伏地蹲避，这两日人也随即原车折回。但在返回途中遇到了闻警出巡的中方保安队，这两个日本人又朝他们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保安队士兵1人。中方因事态严重忍无可忍，不得不采取适当的自卫手段，两日人在我反击中被击毙。这就是所谓的“虹桥事件”，它最终成为“八一三”事变的导火线，上海局势由此急转直下，大战一触即发。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长俞鸿钧立刻用电话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询问，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周珏也向日本海军武官本田通话探询。但是当时冈本和本田都不相信会有这事发生，并且声明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这天没有奉命外出的；纵然有人外出，也决不会去虹桥机场，因为日本官兵是绝对不应该到该机场的。

当夜10时，俞鸿钧亲赴日本总领事馆交涉。他首先叙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并主张用外交途径解决，勿使事态扩大。日方表示同意。旋即上海市府秘书、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代表们陪同日方官员及日籍记者多人，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调查，并由日方将被击毙的日本官兵尸体领回。似乎这一事件因此该画上句号了。

然而这一切毕竟都是日方蓄意发动战争的准备，日方驻沪外交当局虽然表面上同意遵循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其实却是彻头彻尾的缓兵之计，其本质则是企图扩大事态，达到其不可告人的阴谋。

果不其然，8月11日下午4时，冈本会见了俞鸿钧，态度即转趋强硬，声称对于被击毙二日本官兵的虹桥事件，日本全国上下极为震动，在京日本当局虽然同意用外交途径解决，但同时又认为有“质问”中国的必要，并附带提出两项要求（1）将保安队撤退；（2）将保安队已筑的防御工事完全撤除。俞鸿钧提出，中国政府对此事件极为重视，希望双方能平心静气地处理此事件。而离日侨居住区较近的保卫队已“稍稍后退，以免冲突”。冈本随即询问保安队已后退的距离，并建议由中日双方共同决定。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俞鸿钧的严辞拒绝。冈本旋又提出一些要求，俞鸿钧一一作答，冈本对于这些答复表示满意，并说当即报告日本政府。此时，俞鸿钧反质冈本，问他是否知道日本军舰已有16艘来到上海，而且还有军队登陆，“在此一面用外交交涉之际，一面增加军舰，是乃威胁”。冈本对增舰一事开始称不知道，后来又如果说双方能用诚意交涉，虽然增舰也没有关系云云。

也就是在同一天，在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到中国外交部施加压力，要求中央政府督促上海市府公平地了结虹桥事件一案。倒也是一副像模像样的“外交途径”。

8月12日下午3时，日本方面又装模作样地提出召开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会议来“解决”此案，此委员会是为了终结“一二八”战争而由上海有关各国所共同促成和组织的仲裁性组织。在会议上冈本指责中国保安队及正式军队在限制区域内继续推进的作战准备，妨碍租界安全，违反停战协定，

要求各国代表采取有效方法予以制裁。中方代表依情据理地一一加以驳斥，并称日方一方面同意以外交方式解决，一方面又增加军队，影响各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对中国构成威胁与危害。最后会议无任何结果而散，正常的外交途径至此告终。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一支日军武装便衣队窜入横滨路上海保安团防地，哨兵拦阻无效，对天鸣枪警告，日军便衣队即向他们开火。挑衅的日军经不住我保安部队的猛烈还击，狼狈地逃窜了。

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又于10时30分左右，突然向守卫天通庵、八字桥和东宝兴路方向的我守军发动袭击，又被早有准备的中国军队击退。

时至下午3时50分，日军开始大规模进攻，并以大炮轰击。中国军队奉命反击，“八一三”事件爆发了！

### 三、誓不与倭奴共戴一天

国民政府对于上海保卫战的爆发是有所准备的，这主要是出于自身防卫的需要，特别是防止日军像“一二八”事变那样再度攻击淞沪，进而威胁南京。“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更是从其战略眼光出发，开辟淞沪战场，将战略防御重心置于华东地区。而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军队将士的爱国热忱，也是不可抹煞的。

早在1935年，国民政府就开始在各战略要地修筑国防工事，“构筑实施之程序，系以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江海防工事的顺序是“先求巩固长江下游之江防，其次浙及闽、粤、苏、鲁诸海岸”。至七七事变爆发，江浙地区预定修筑工事2508个中已完成2264个，并修成三道坚固防线：从长江下游的福山起，经常熟、苏州、嘉兴、平湖到杭州湾乍浦的防线；从江阴到无锡的防线；以茅山为中心的南京外围防线。1935年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制定了《国防作战计划》，划分了战区和防卫区，规定“驻江南部队应集结于京沪线及首都附近，一面往淞沪方面之增援，并相机扑灭上海之敌势力，一面防止长江敌舰之侵扰，以维护首都”。

1936年，张治中出任京沪警备司令，具体着手京沪防御作战事宜。他在陆军军官学校内设“高级教官室”，驻扎苏州，专门主持制订京沪地区防御计划及其实施过程，诸如兵力部署、指挥系统、后勤供应、民众动员、舆论宣传等。该室为掩护隐蔽起见，后改名为“野营办事处”，在沪宁线上包有一节专用车厢，随时可以挂在任何一次列车上。

1936年底，张治中曾组织军事参谋人员到苏州、常熟、太仓、浏河、吴淞一带考察，还组织过一次5个师的军事演习，模拟阻击日军登陆作战。沪宁线沿线各站还奉命专门组织了军运准备演习。京沪警察司令部还和上海市府合作，在市区设置防御工事，以阻止日军从黄浦江登陆。为预防不测，国民政府还同意张治中的建议，以一个加强旅伪装成保安队进驻上海虹桥地区。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命令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在苏州、无锡一带集结，并调正在安徽蚌埠的第三十六师赴沪应变。

8月9日“虹桥事变”发生后，11日深夜张治中奉命率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向上海推进，奉命赶来的还有原驻汉口的九十八师等部队。海军则将江阴以下长江下游中的舰标全部破除，并在江阴江面沉船43艘，筑成江阴阻塞线，大部分军舰也驶入长江，这些奉命保卫上海的部队，给人的印象和过去国民党军队很不相同，正如上海英文《大美晚报》记者勃鲁司报道的：“此八十八师队伍，俨如曾受高等训练之外籍部队，御新式合用之制服，头戴德国式钢帽，往来巡逻，极为尽职。”8月12日，中国军队自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5年来首次进入上海。市民们目睹此景，无不奔走相告喜形于色。而早在7月30日，张治中已电示蒋介石开战的时机问题，而蒋介石则回电称：“希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

然而，日军侵略者并不以小规模冲突为限，更不以蒋介石的极力避战而放弃他们的真实目的，“八一三”事变最终爆发了。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实行天赋之自卫权”，抗击侵略者。8月15日，张治中发表抗战通电，称“治中奉命统率所部，星驰援应，保卫我先祖列宗筚路蓝缕辛苦经营之国土，争取我四亿五千万炎黄华胄之生存，誓不与倭奴共戴一天。今日之事为甲午以来四五十年之最后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壮，

彼为发挥野心之侵略，我为决死求生之自卫，无论暴敌如何猖狂，最终胜利，必属于我。”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上海奋起迎敌，这不仅是由于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的侵略本性所致，也是国民政府抗战初期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不能忽略的。

随着平津失守，迫使国民政府处于非战不可的境地，国民政府准备用阵地战层层阻挡华北日军的进攻。而当虹桥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出于种种考虑决定将淞沪作为战略防御重点。“八一三”事件发生后，国民党这一战略行动正式实施。正如8月20日视察完上海战况返回南京的陈诚向蒋介石所建议的：“日军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直趋武汉；武汉一旦失守，则中国将东西纵断为二。故不如扩大淞沪战场，诱敌至东战场。”蒋介石采纳了陈诚的意见。于是时至8月15日，已有几十万精锐部队开进淞沪战场，国民政府试图集中主力部队在此一举击垮当面之敌，赢得局部胜利，造成结束战局的时机。

然而，这一军事战略行动的政治策略含义是更为明显的。首先，国民政府企图由此引起英美等国的干涉，达到尽快结束战争的目的，正如李宗仁所言：“在上海和敌人用主力火拼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第二，等待苏联出兵。他们认为日苏矛盾和对抗日益加剧，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苏联一旦出兵，战争自然就会大有改观；第三，为了维护国民党官僚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华北地区向来非蒋介石的地盘，而江浙一带对蒋介石政权来说则是举足轻重的地方，与其保卫于中央势力艰难插足的华北，还不如保卫至关重要的长江下游地带。

历史证明，国民政府开辟东战场是战略防御方向的一大失策，它导致华北、华东相继沦陷，日军得以从东、北两面合击中原。然而，此时的国民政府还正得意洋洋地努力实现这一“战略方向”呢！



#### 四、宝山应改号姚营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时，我军人数远远超过日军，我军海军和空军与陆军协同作战，重创日军，先后攻占了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公大纱厂、日军苦心经营多年的堡垒——日海军俱乐部等地。8月19日，我军攻下汇山码头，将日军战线一切为二首尾不能相顾，取得了开仗以来最大的胜利。时至8月22日，我军两翼共同向日军进攻，当时日军只能死守几个主要据点以待援兵。“24小时内占领上海”的美梦被上海军民彻底粉碎了。然而随着8月23日日军援兵分别在蕴藻浜和吴淞登陆，先头部队已开抵罗店，“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攻势作战阶段随之结束，相持作战阶段开始。

日军开抵罗店后，意欲打通吴淞与罗店的联系，使浏河、罗店、宝山、吴淞、蕴藻浜、江湾次及北四川路底的日军联成一线，并从此线向我军发动总攻。位于海滨的宝山遂成为这条线上极其重要的一环，如果宝山不被日军攻下，则日军无法连接，且有被我各个击破的可能。8月30日第九十八师五百八十三团第三营奉命固守宝山，其营长即姚子青。这位年仅28岁的营长系广东平远县人，黄埔6期毕业生，一副近视眼镜使他显得清秀而儒雅，而深知其人的则知道他有着16岁从军英勇善战屡立战功的光辉历史。

自9月1日起，宝山县城已在日军战舰上大炮的射程之内，日本飞机轮番前来轰炸。同日清晨，日本援军再度在吴淞镇登陆，激战数小时后我军后撤，日军继续向宝山推进。姚子青率部出城迎击，重创日军。日军死伤数百人，退回了吴淞。2日，日军又分别从浏河、吴淞镇及虹口、江湾等地进犯宝山，我军又予以击退。4日，日军再度猛扑宝山，并与川沙口的日军互为呼应，对我宝山实行夹攻。姚子青率领部队迎战于金家宅。当天晚上，日军从炮台湾登陆，向宝山发动攻击。姚子青率部通宵血战，宝山城岿然不动。

日军因宝山久攻不下，遂于9月5日起结集军舰30余艘，飞机20架，辅以步兵20余辆坦克，对我宝山守军实行海陆空三面包围攻击。我军城外阵地已全部毁于炮火，于是奋勇据城死守，此时全营官兵已伤亡过半，但他们仍致电第九十八师师长夏楚中：“誓本与敌皆亡之旨，固守城垣，一息尚存，奋斗到底！”7日清晨，日军大炮将宝山城墙轰开一个缺口，日军拟从缺口入城，终为守军击退。然而蜂拥而来的日军最终从城墙的东南角冲进了宝山，姚子青指挥仅存的20多名官兵作最后的拼战，最后被炮弹击中壮烈殉国。除1人越城逃出外，三营全体官兵实现了与宝山同归于尽的誓言！

宝山保卫战历时9天，日军花费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才得手，据称日军耗费的弹药一项就在10万美元以上。消息传出，姚子青全营官兵与城共亡的壮烈行为受到了普遍的嘉奖和称颂。9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通电全国：“宝山之战，姚子青全营与孤城并命，志气之壮，死事之烈，尤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也著文称颂不已：“此次姚营全部殉城，其伟大壮烈实令人内心震动而肃然起敬。此非仅中国人之光荣，亦为全人类之光荣，其伟绩将永垂史册而不朽。”国民党元老马君武的《抗日纪事诗》则将此进行了生动的诗化性描述，则更是令人难以忘怀：

六百余人齐授命，  
宝山应改号姚营，  
肉弹枪械争强弱，  
国土官兵共死生。

## 五、罗店：血肉磨坊

宝山失守，标志着湘沪抗战最为激烈的防御固守阶段的降临。在此阶段，日军频频增兵上海，投入兵力已达 10 万之众，并藉其轰炸和摧毁我军阵地。我军将士愈战愈勇，寸土必争。双方短兵相接，反复冲杀，伤亡均极惨重。而在罗店及罗店附近阵地展开的拉锯战，则以其“血肉磨坊”之称而载入史册。

罗店，是沪太路上的重镇，它南接上海，北连太仓，是上海和江苏的交界线，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北面浏河位于长江口，沿江一线，北有扬林口、七丫口，南有石洞口，都是长江沿岸重要的登陆点。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日军正是在这里乘虚而入。所谓“浏河登陆”遂成为淞沪抗战的转折点，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于是，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以罗店为中心，中日两军在长江岸边这片冲积平原上又展开了一场寸土必争的阵地战。历史又一次重演了！

8 月 23 日，日军故伎重演，在我军兵力薄弱的川沙口和浏河镇一线登陆成功，抢占了罗店。接到此消息后，张治中马上意识到敌人已抄到我军背后，全军有被包围的危险。他马上派出第十一、九十八师迅速赶赴罗店，扑灭登陆的敌人。第十一师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以果断神速到达罗店迎战，他们乘日军立足未稳全力猛攻，至晚上 8 时收复罗店。

8 月 25 日，当拂晓时分第十一、九十八师主力正在罗店西北扫荡敌军时，从石洞口、小川沙登陆的日军乘我军阵地没有巩固之际，集中飞机、大炮向罗店猛轰，步兵随之发动进攻。这时守备罗店的我军仅 1 营兵力，在日军暴雨般炮弹炸弹的轰击下，镇上民房基本被炸毁，尚未修好的阵地也被破坏。我军虽然无险可凭，但仍拼死防守。直到晚上 8 时，第六十七师主力部队才从浏河赶回罗店反攻。得知罗卓英 4 个师非但不能扑灭登陆之敌，相反又失去了罗店，蒋介石心急如焚地于晚上 9 时电令罗卓英“今晚必须收复罗店”。此时由于军官伤亡过重，我军有溃退的趋势，日军乘机猛追。只见少将旅长蔡炳炎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他训示全旅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前进者生，后退者死，不得畏避！”当他和官兵奋勇冲击几百米后，不幸胸部中弹，但蔡炳炎仍在高呼：“前进！”罗店仍然在我军的手中！

8 月 27 日晚，川沙口又有大批日军登陆，他们向罗店发动了第 3 次进攻。从 28 日上午 8 时到下午 3 时，日军的飞机和大炮的轰炸一刻不停，爆炸掀起的烟尘气浪卷起了飞沙走石，笼罩了全镇，每一寸土地都是血和火。到下午 6 时，守军伤亡大半被迫退出罗店，在罗店南面与日军对峙。

听说罗店再度吃紧，蒋介石赶到前线司令部，召集各路兵马紧急增援罗店。于是，第十四师第四十二旅的两个团奉命星夜奔赴罗店，第六十七师和第十一师的一个旅协同作战，经过 5 小时的血战，冲锋十多次，终于在半夜时分夺回了罗店南半部，与占据镇北的日军对峙。两军往复争夺，日夜不停。

8 月 29 日晚上，从安亭赶来增援的第五十一师在罗店西面的施相公庙设立了指挥所，派三营营长乘引敌击来，然后集中兵力歼灭。胡豪带着部队静肃前进，乘敌不防突入罗店，打开缺口后轻重火器一齐扫射，睡梦中的日军乱作一团，慌忙应战。三营且打且退，诱敌追击。日军不知是计，猛烈追杀而来。当突击队退到距施相公庙约 200 米地带，早已埋伏在此的我军突然以最猛烈的火力向仓皇的日军扫射，一时间敌军死伤累累大败而退。胡豪的夜

袭诱敌受到了上级的传令表扬。

1937年9月3日国民军第十八军司令部油印的《罗店十日战记》中写道：“罗店一镇，目前为敌我必争之要点。苦战旬日，异常惨烈，敌军伤亡已逾3000，我军阵亡官兵5000余人……”9月19日时值我国传统佳节中秋节，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在此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挥笔写下了一首七绝《战地中秋》，抒发了此时他的万千感慨：

战火漫天战马腾，  
江波海浪涌层层。  
健儿争饮倭儿血，  
手挽酋头笑月明。

这是罗卓英的“诗言志”，这又何尝不是罗店前线数万中国官兵的豪气！

争取罗店及其外围的战斗是那么的惊心动魄，中国军队往往以“一寸山河一寸血”来概括这片土地上的激烈搏杀，而日本军队则称罗店为“血肉磨坊”。日本陆军省和上海派遣军官兵对罗店及罗店附近的村庄印象极深，厚厚的战死者登记册和陆续寄回去的死亡通知书上，关于战死的地点一栏，许多人都填着“月浦”、“吴淞”、“蕴藻浜”和“罗店”……

罗店，这个仅有2.3平方公里的宝山县第一大镇，这个清末便有700家店铺、三湾九街十八弄的江南名镇，在日寇的铁蹄下遭受的蹂躏，我们用几百字是无法说尽的！

## 六、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经过2个多月的血战，10月24日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攻陷大场，国民党军队四面受敌，有被切断退路的危险，中国军队开始全线撤退。由于政略和战略双方面的原因，本来尚能从容有组织的撤退，变成了全线溃败。时至11月11日夜，中国军队最终放弃上海。次日，日军经过3个月鏖战，动用20余万兵力，伤亡6万之众后，终于占领了上海！但是当10月27日晨我们撤退过程中，出现了一支名震中外的八百壮士，他们的领袖人物便是谢晋元。

当我军从闸北、江湾撤退时，我八十八师五百二十四团奉命断后，团长韩宪云率两营官兵掩护大军，团副谢晋元等带领部分官兵约800人扼守要点。10月27日晨4时，我军撤退完毕，谢晋元所部本可从容退却，但他们因为团长下落不明，而守土有责，为了复仇雪恨，抱着与阵地同存亡的决心，决定与日军作殊死战。这便是当时闻名遐迩的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

大军撤出后，谢晋元将大部官兵安排据守在苏州河畔新垃圾桥北的四行仓库内，另有少数官兵分守附近其他大楼，与四行仓库互为犄角。这四行仓库南临苏州河，北与上海火车站相望，东为西藏路，地当要冲。仓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又较密闭，架设武器后，便是一座坚实的堡垒。在此设置据点，确实能收牵制敌人之效。此时日军尚未到达，与四行仓库一河之隔的租界武装英国驻军见我军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曾主动劝我八百壮士放下武器，并准许他们从租界通过，但遭到了谢晋元的谢绝：“我们的魂，可以离开我们的身，枪不能离开我们的手。没有命令，死也不退。”《新闻报》记者闻讯赶去采访，谢晋元也向他表达了同样的态度：“以身许国是我军人应有的天职。”他还签名题字：“余一枪一弹，决与倭寇周旋到底！”

时隔不久，日军进占闸北，搜索前进，遇到了四行仓库内中国守军的猛烈回击。日军不知虚实，不敢轻进，于是先用大炮乱轰，继而又组织精锐部队轮番进攻，意在一举攻下我军这一最后据点。午后时分，日军发起了猛攻。谢晋元率部沉着应战，居高临下，猛掷手榴弹、炸弹，打得日军鬼哭狼嚎，前后激战3小时，日军除了在苏州河边抛下了60多具伤亡士兵外，始终无法接近仓库大楼。于是日军改用包围形式与我军对峙，伺机攻袭。谢晋元激励官兵们说：“我们不撤退，不投降，四行仓库就是我们的坟墓！”

28日拂晓，一小股日军在新垃圾桥畔打旗语，准备攻打四行仓库。只见一位年轻的战士身缚手榴弹，突然从六楼窗口纵身跃入敌群，与敌群同归于尽。不久，日机多架飞临四行仓库上空侦察多时，经守军不断的机枪射击始行离去。此时，租界英军再度劝告四行仓库守军放下武器，但仍为谢晋元等所拒绝。这天日军出动飞机、汽艇进行了4次进攻，都被击退。时至下午3时，日军不敢正面进攻，改在远处射击，同时将四行仓库四周建筑物完全焚毁。此时原驻其他大楼中的我军将士，大多数均已以身报国。

29日，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已进入了第3天。这天下午日军设下陷阱，故意将包围四行仓库的队伍稍稍后撤，诱使我军突围出击。不料我军与四行仓库共存亡的决心不可动摇，敌军这一诱骗手段未能得逞。下午3时30分，日军派铁驳船两艘，满载钢炮机枪，打算由外白渡桥冲入苏州河，向四行仓库沿河大门发动进攻。此举为租界英军所阻止而未果。晚上9时和10时，日军两度出动两辆坦克，掩护200多名步兵推进，结果都以车毁人伤告终。

30日，孤军奋战已经3昼夜，日军又多次出动飞机、坦克向四行仓库进攻，他们甚至以平射炮向我军猛轰，炮弹多至每秒钟一发。我军依旧坚守，四行仓库安然无恙。当晚日军炮火、炸弹使四行仓库成为一片火海。在敌兵四伏的险境中，谢晋元部孤军士气高涨，雄踞危楼巍然屹立。

经过4天4夜的激战，30日晚9时，谢晋元接到撤出四行仓库的命令。他立即整饬队伍，于31日晨2时15分，率余部以3挺机枪为掩护冲破敌阵，全部退入租界。而最后离开阵地的，就是谢晋元。此役我八百壮士共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余人，而自己仅30余人的伤亡。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宁愿死，不退让；  
宁愿死，不投降！……  
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  
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这首题为《歌八百壮士》的激昂歌曲便是当时流传于上海的歌颂八百壮士的颂歌。当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屡挫敌寇的消息传开后，上海人民无不奔走相告肃然起敬，每天总有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聚集在苏州河南岸观看。附近马路、里弄和大厦的屋顶、窗口中也都有人张望动静。27日孤军吁请上海人民接济食品后，前来送慰劳品的人有的用卡车运送，有的随身携带隔河投掷。长沙路、牯岭路等附近马路的居民乃至有的难民收容所，都自动绝食1天或半天，以接济孤军。在苏州河南各马路口，接济孤军的面包、糖果、水果、牛奶、罐头等食品堆积如山。河北岸日军不时放枪，流弹四射，但环观慰劳的民众仍不肯离去。因为捐赠物品实在太多，以至谢晋元不得不致函上海市民，感激之余并婉言拒收：“如果盛意难却，最好购买救国公债，或捐助现金，作全国抗战牺牲官兵之抚恤，以免浪费而切实际。”

八百壮士可歌可泣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国内外，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国际舆论也广为赞扬。何香凝发函慰问：“你们每一个人，都已充满了孙总理和廖党代表的革命精神、牺牲精神”，“殉国的将士将因为你们而愈伟大，前线的将士将因为你们而愈英勇，全国同胞将因为你们而愈加团结，国际人士也将因为你们而愈能主持正义了”。当时有一外籍友人，署名“崇拜者”投信上海《泰晤士报》，热烈歌颂孤军“为中国战士争光荣，为中国主权求保全，为民族生存而奋斗，是为人道而战，为文明而战，为和平而战”，“全世界的青年人，均知此八百壮士为盖世的英雄”。

退入租界后，谢晋元所部旋为租界当局收缴枪械羁禁“孤军营”中，在此困难环境中谢晋元等仍坚持斗争，作诗自励：

勇敢东敌八百兵，  
千无聊赖诗以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  
说到倭奴气不平。

1941年4月24日晨，谢晋元终为被汪伪收买的叛兵杀害，时年仅37岁。消息传开后，上海各界人民深为哀悼，前往吊唁者达30余万人。抗战结束后，上海人民设置了“晋元路”、“晋元中学”和“晋元公园”。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褒扬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1983年在虹桥万国公墓内重建谢晋元新墓，1985年又在晋元中学内树碑以志纪念。上海人民将永

远怀念这位率领 800 壮士坚苦奋战的抗日将领。

## 七、飞将军一战成功 六比 大胜倭寇

“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我空军也奋勇参战，虽然力量极为有限，但由于空军官兵英勇无畏，也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其中以“八一四”杭州笕桥空战最为著名，值得大书特书。

七七事变爆发后，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经过紧张准备后，决定内迁广西柳州机场和云南昆明机场。正当此时，“八一三”抗战爆发了，8月13日下午，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领其大队从河南周家口飞到笕桥机场待命。空军第四大队是当时中国空军作战部队中配备力量最整齐的一个大队，其成员均为笕桥航校毕业生，配备的战斗机则是清一色的美制“霍克”战斗机，而高志航则是当时中国空军中的佼佼者。

祖籍黑龙江通化的高志航早年投笔从戎考入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学习，在就学期间，东北军扩建空军，高志航便立志去法国学习空军。而当时的东北军教育长郭松龄嫌他个子太小出国会给中国人丢脸，高志航坚定地表示，自己决心出国学习航空，将来立志杀敌报国。当时在座的郭松龄的夫人听了很是感动：“你有这样的好学生，一定派他出国留学深造，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个英雄人物。”就这样，在郭松龄夫人的鼓励下，高志航终于在1924年赴法学习了2年航空，回国后被张学良将军任命为少校驾驶员，时年仅19岁。1936年蒋介石50岁祝寿期间，高志航所在的飞行大队进京表演。蒋介石见了高志航的高超表演很是赞赏，立即命令召见，并鼓励说：“你的技术很高，敢超世界水平。”当即把自己的“天商”号飞机奖给高志航自用。从此高志航得以一举成名。

此后，蒋介石命令高志航去意大利购买飞机。高志航抵达意大利后，会见了首相墨索里尼。根据中意双方议定，两国飞行员共同进行表演，高志航的精湛技术深受称赞。但是当意大利军火商企图用大批金钱行贿，诱使高志航购买落后的飞机时，高志航拒不受贿，将意币掷地而去。他在向墨索里尼辞行时说：“贵国飞机已经太落后了，并且贵国用行贿方式出售飞机，我们中国人决不接受。”墨索里尼非常钦佩高志航的行为，即将身上自带的钢笔式手枪送给他作为纪念，同时又来电赞美高志航不辱使命。高志航的名声因此更大了。不久他就被任命为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

就在高志航率领其飞行大队抵达杭州笕桥机场的第2天，即8月14日下午1时30分，浙江曹娥对空监视哨报告日军9架轰炸机正直飞杭州笕桥机场。此时杭州指挥官遍找不到，副指挥官则不懂飞机性能无法指挥作战。高志航挺身而出，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当即在全大队中抽点39个人，命令他们，“背上保险伞立即跟我出发！我首先起飞，你们一个接着一个起飞。在空中不要失去联系，抓住敌机立即攻击，最好以后上方进击”。他又鼓励大家说：“大家必须抱着有我无敌，有敌无我，视死如归的决心！”

接着高志航率先起飞拦住日机撕杀，此时只见笕桥机场上空无数铁鹰有的俯冲，有的仰攻，翻腾旋转得满天黑圈，令人眼花缭乱。不久高志航首开第一炮，一架日机旋变成一团大火，摇摇晃晃地外半山腰撞去。急接着，又一架日机被我机击成一团大火，飘出了云层；在蚕桑学校南端上空，第3架日机又被我击中着火坠落……10分钟战斗后，我军击落日机6架，2架受伤逃战。用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的话来说，“此事打破日本空军对中国空军不堪一击之迷梦”。当高志航返航回到停机坪上时，地面上的所有飞行员都拥

到他的机旁，高声欢呼。此情此景，真令人兴奋难忘。高志航从此成了空中英雄，应验了郭松龄夫人的预言！

捷报传来，当时报纸的号外刊出醒目的大字标题《飞将军一战成功 六比 大胜倭寇》，杭州城里一片欢腾！不久，经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提议，8月14日被国民政府空军司令部定为“空军节”。从此，每年到了这一天，国民党空军各部队、学校都举行盛大的舞会、游艺会等庆祝活动，庆祝自己的光辉节日。蒋介石更为此次空中大捷所陶醉，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寒其胆矣。”而在8年浴血抗战期间，如此得意的日记毕竟是不多见的。

中国空军已瞩目世界，而中国空军飞行员的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就连她的敌人也不得不敬佩有加。日本大阪的《每日新闻》8月31日曾刊出过其特派记者发自上海大场的报道，事关一位中国飞行员的英勇事迹。

那是8月17日中午11时许，中国空军2510号战机及其友机在将复仇的炸弹投掷在敌军阵地上后，不幸被日军击落。只见机座中弹后弹出了一个小白点，伞花飘舞而下。因风向稍偏，中国飞行员飘落到了日军的阵地上，狂欢的日军从四面八方飞奔着包围过来，他们要活捉这位中国飞行员。只见这位年轻的中国飞行员英武地挺立着，右手紧握左轮手枪，当蜂拥的日军冲上来时，他举枪打倒了3个敌人。几百个日军高喊着“支那空军快投降”再次包圈过来，中国飞行员再度举枪击倒了两名日军，随后毫无惧色地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射出了最后一颗子弹！

日军官兵们目睹这一场景，无不目瞪口呆。惊叹之余，他们不由得生出了几许的钦佩和崇敬，他们为这位中国飞行员建立了墓碑：“支那空军勇士之墓”。《每日新闻》惊叹道：“中国已非昔日之支那！”日本东京新宿举办了“中国空军勇士阎海文之友展览会”，玻璃橱窗里陈列了烈士的飞行服、降落伞和手枪等遗物，参观者络绎不绝。

这里，我们得知了这位中国飞行员烈士名叫阎海文，这是位27岁的少尉飞行员，辽宁省人氏。而在整个抗战时期，为国慨然捐躯的阎海文式的空中英雄又何仅阎海文一人！



## 八、看不见的战线

正当“八一三”淞沪抗战硝烟弥漫之际，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也正紧张缜密地进行着较量，这就是反间谍战。这其中以黄浚日谍案和南本反间谍案最为精采。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高机密的情报便经常泄露，给中国军队的守备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失。蒋介石立即召来军统局的戴笠、中统局的徐恩曾和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限他们一个月之内破案。

戴笠立即亲自上阵，将参加最高机密制定过程的军政要员逐一调查，并查询了机密文件的保管情况以及密令的传达过程，但都没有发现蛛丝马迹。随着，戴笠又下令将参加最高国防会议成员及其亲属的所有资料再筛选一遍。这次果然发现了疑点，担任行政院机要秘书的黄浚之子黄晟成为怀疑对象！

这个黄浚说来也是个小文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精通日语，深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赏识。他生活奢华，挥金如土，喜欢结交权贵，且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关系密切。须磨常以请教汉诗为理由与黄浚接近，须磨1936年回国后还指定人与黄浚保持联系。而黄浚之子黄晟曾留学日本，现任外交部副科长，也是一亲日分子，他常去汤山温泉军政部俱乐部，与一名叫廖雅权的女招待关系亲密。

黄浚父子的日本背景使戴笠大为警惕，而据他的了解，这廖雅权竟是日本女特务南造云子的化名，这更使戴笠对黄浚父子怀疑加剧。然而，几天的跟踪没有发现黄浚任何异常之处。于是戴笠呈请蒋介石再召集一次国防会议，仍由黄浚记录。这时，淞沪抗战两军搏杀正酣，蒋介石召集军政要员宣读了几份机密电报，部署新的作战要点。谁都不知道这是戴笠导演的一出反间谍戏。

当晚黄浚身穿旧服，头戴一顶宽边新呢帽独自来到了夫子庙附近的一家酒店，独自斟饮了起来。一会儿黄浚脸红耳热，便走到楼梯口，将头上的呢帽挂在了墙壁的钉子上，仍回到原座喝酒，一副闲散无事的样子。这时，另有一位顾客也走到楼梯口，脱去头上呢帽挂在墙上。两顶呢帽大小颜色完全相同。此时坐在不远处的密探便觉得其中有诈。再看挂帽的人，虽穿着中国服饰，但举止行为极似日本人。

密探心中已明白了。不一会儿，那日本人站起身付了酒钱，到楼梯口匆忙摘下黄浚的呢帽戴到了头上，急步离开了酒店。密探不露声色地立即跟踪而去，最终果然从他呢帽的边缘处搜出黄浚亲笔写的一纸情报。至此，黄浚间谍案真相大白。

8月26日早晨7时，黄浚、黄晟等18名罪大恶极的日本间谍验明正身后，绑赴刑场枪决。抗战初期钻入中国高级军政机关的第一个日谍案从此划上了句号，而另一件南本反间谍案则刚刚开幕呢。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日军屡战屡败，逐步增兵换将也未能占领上海。到9月底10月初时，蒋介石多年精心培植起来的嫡系精锐部队也大多投入了战场，而且做出了重大的牺牲。此时，经宋子文出谋划策，国民政府将希望寄托在了《九国公约》上，幻想欧美帝国主义出面进行调解干涉，从而解决中日争端。在此背景下，华北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的助手南本实隆少将潜来上海，伺机探得我军对日作战的最高机密，并谋杀宋子文。而戴笠

得讯后，便派出了其手下的得力干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校人事科长文强化装成军委会少将高参，与其周旋。

第1次约见时，文强便受了一场虚惊。那天南本对他想攫取的东西只字不提，只是一味询问文强的身世经历、兴趣爱好等。对此文强将原来编好的一套天衣无缝地一一作答，使南本信以为真，约定彼此两日后再见面，临行前取出一大捆用绳索扎好、用火漆盖着中央银行戳记的东西送给文强，说是初次见面的见面礼。文强返回住所后，只认定这捆不过是行贿的现款而已，但戴笠却极度怀疑这是颗炸弹。但戴笠最终查明这果然只是1万元法币的现款，而他就此判断道：南本这份见面礼极厚，这反映了他们正饥不择食，而我们则机不可失。

第2次约见地点安排在虹口日本——俱乐部内，这时南本便合盘提出了他的所有问题：中国统帅部对淞沪战争的决心如何？对日作战之动员兵力配备如何？《九国公约》的制裁倡议是否出自于宋子文的谋略？对陶德曼奔走和谈的看法如何？文强采取不关门的讨价还价策略，回答说不但下次准可答复，甚至可以以书面答复。南本对书面答复特感兴趣，便直截了当地问需要多少钱，对此文强则故意淡然置之，但表示资料不在我手，行情尚待探询，过急过早难望有成。对此南本表示理解。

第3次约见时，文强装出一副讨价还价的样子，将他和戴笠自己拟定的第2题的代价“炒”到了200万元。当南本等人挤成一堆念念有词地细读这第2题的“答案”时，文强情不自禁地暗笑不止。但戴笠认为日本人最小气，下次会谈难免有变。

结果不出戴笠的预料，第4次会谈时文强并没有收到上次说好交付的200万元现款。南本表示这价格实在太高了。最后经过双方一番争执，说定下次支取400万元九折付款。第5次会谈时，日本人带来了40万元现款，另外其余360万元开的是日本正金银行的支票，并要以此换取其余3题的答案。文强表示日方如此一再食言，深以为憾，建议改日在原德租界赫德路某号续谈，南本表示同意。

接着，文强又和南本先后进行了2次会谈，南本一则就“答案”的价格反复讨价还价，二则表示一定要破坏正在进行中的和谈，同时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不惜任何代价暗杀所谓“中日和谈的障碍”的宋子文。但是第8次会谈时，文强一等再等，南本再也没有露面。午后6时，戴笠紧急通知文强，日军已从金山卫登陆了，南本自然对这4个问题的答案再也用不着了，对新的要求也无所谓了。至此，“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的这场反间谍小插曲也就不了了之了，然而它反映出的一波三折扑朔迷离的间谍战过程，却令人回味无穷。

## 九、空前绝后的劫难

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战争后，对上海城乡进行了残酷的轰炸焚烧，对上海人民施杀掳掠、屠杀和奸淫，使上海蒙受了空前绝后的劫难。

淞沪抗战期间，日军派遣大量轰炸机，对上海的工厂、医院、学校和村镇等非军事目标施以狂轰滥炸。8月28日，日军轰炸南车站，机车及车站设备多被毁坏，等候于此的难民被炸死伤者达六七百人。据当时《立报》记者报道说：“死者倒卧于地，伤者转侧呼号，残肢头颅，触目皆是，血流成渠，泥土尽赤，景象之惨，无以复加。”在此之前，日机还不顾国际法规定，对已改作伤兵医院、门口挂着红十字会旗子的东南医学院等进行轰炸。以当时舆论界的说法，“此种绝无理性有背人道举动，实可谓向全人类挑战”。

日本侵略军在狂轰滥炸之余，还对城镇进行了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肆焚烧。战争刚爆发时，日军和日本间谍就在虹口纵火焚房。8月17日，日军在杨树浦引翔镇败退前，一把火将全镇烧了个精光。8月21日晨，日军退出百老汇路（今大名路）时，又把唐山路等一带变成火海。10月27日，日军占领闸北后，几千幢民房又被烧成了灰烬。损失最大、被烧得最惨首推南市，这里被日军纵火后，大火整整烧了22天。而最为宏伟堂皇的市府大厦，不仅碧瓦破碎，檐梁摧断，就连大厦的内部机构也被一把火烧得精光！

日军对占领地进行了野蛮的掠夺。虹口、闸北、杨树浦等地沦陷后，日本海军组织了所谓的“清扫班”，每天派出万名小工掳掠未被摧毁的物资，每天总有两三艘船专运废铁赴日本，几个月内，日军从上海劫夺的钢铁超过10万吨。“清扫班”对于侥幸尚存的工厂，不管是机器设备、原材料、存货等，都要“清扫”一空。难怪当时的人们称这“清扫班”为“强盗队伍”了。在搜乱掠夺物资过程中，日军官兵也乘机大发横财，正如战后日军士兵的自供状，当时他们在上海的行为“和盗贼没有什么区别”。

此外，日军还公然允准日商强占沦陷区内的中国企业，准许日侨掠夺中国居民的财产。龙华的上海水泥厂和17家纺织厂被日人占为己有。日本华中蚕丝公司强占了3家丝厂，日本三兴面粉公司侵占了3家面粉厂，其余的制粉厂也被日本制粉公司和日清制粉公司瓜分。江南造船所等造船厂被三菱重工业公司所霸占，另一些船厂的机器则为日清公司占有，“每厂派有数兵驻守，不准各厂产权人入内”。同时，日军在上海强迫流通军用票，这是一种无法兑现的货币，连日本商人也表示“非军人军属，其所持军票不收”，公然对它表示蔑视和憎恶。

日本侵略军杀人成性，上海沦陷区人民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8月23日，（农历七月十八日），日军在小川沙登陆，罗泾乡10多个自然村被烧房1000多间，被害村民2244人，占全乡总人口的80%。村民赵志冲一家5人被日军用刀砍死，他即将生产的妻子竟被日军开肚破膛，取出胎儿寻欢作乐！农历七月十八日作为全乡的祭日沿袭至今，一块刻有“永志不忘”4个大字的花岗岩石碑，矗立在当时侵略日军的登陆点上。11月5日，日本援军在金山卫登陆，他们在金山卫整整烧了3天，杀了3天，残杀村民1015人，烧毁民房3059间，村里的一口赤旱塘，竟成了日本侵略军的杀人塘。在上海的一家夜总会里，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还约定进行杀人比赛，看谁先杀死100个中国人，不久他们便在“南京大屠杀”中分别“创造”了屠杀105个和106个中国人的杀人记录，其嗜杀本性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战区内的人民为逃避战火和日军的蹂躏，纷纷扶老携幼逃向租界。8月13日当天，涌入租界的难民就达6万人，高峰时租界难民达70万人。难民的生活极为悲惨，由于人口激增，租界房租猛涨，战前月租仅7元钱的房屋涨至50元。许多难民身无分文，又无亲可投，只能拖儿带女露宿弄堂口或屋檐下，外滩一带的草坪中竟栖息着数千名难民。由于寒湿侵袭，疫病丛生，使难民死亡率居高不下。仅上海普善山庄一处统计，每天收童尸300具左右，成年死者亦超过百名。为了寻觅藏身之处，一些难民在租界偏僻地带搭建简陋的棚户，上海滩上因而又多了一批新建的棚户区。

由于战争中断了食品和原料的来源，市民们义急于储粮以备不测，再加上难民潮水般涌入，租界内物价猛涨。粮价首当其冲，粳米每担从13元涨至17元，煤球、肉、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也随之猛涨。到上海沦陷时，米价已涨到每担18.50元，煤球从每担1元涨到2.40元，豆腐从每斤0.25元涨到0.60元，甚至连咸菜的价格也翻了1倍。这无论是对租界内的居民，还是对难民们无疑都是雪上加霜。

战争带给上海的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也极大。有14所大学、27所中学和44所小学，以及8处社教机构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损失数目高达1094多万元。圣约翰大学一度被封闭，复旦大学则成了日本华中陆军参谋本部所在地。正如当时人们所痛惜暨南大学被炸时的抨击：“它不但炸毁了我们的暨南，它存心着毁灭我们全国所有的一切文化机关；它不但炸死了我们两位同学，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是它扔炸弹的目标！”

短短的3个月中，在日军炮火和法西斯兽行的摧残下，上海城乡满目疮痍暗无天日。100多万居民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全市总损失在30亿元之上，被日军残杀者不计其数，这一切都远远超过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上海蒙受的损失。

这空前绝后的劫难！

## 十、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

“八一三”淞沪抗战一声炮响，从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场运动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都是罕见的。真所谓：“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

这场抗日救亡新高潮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当时，我党在上海设有驻沪办事处，8月下旬改为八路军办事处，11月中共江苏省委得以恢复，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妇委和难民工作委员会等下属机构陆续成立。江苏省委根据周恩来有关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坚持隐蔽和积蓄力量的指示，多次颁发文件，号召上海各界人民行动起来投入抗战，同时派出大批同志深入抗战组织宣传第一线，奋起肩负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责任。

上海工人阶级是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生力军。当战争打响后，许多工人退出了日资企业，他们有的加入了别动队，有的跑到前线协助作战。江苏造船所的职工配合海军，在十六铺董家渡一带凿沉了13艘轮船，还参与敷设水雷和建立封锁线的工作。他们甚至赶造了大批水雷和地雷，亲临前线布雷，炸毁过日汽油舰2艘，炸伤日旗舰1艘。上海有关工团还联名致电美国劳工联合会，请求国际援助：“我们希望美国劳苦大众携起手来，给我们民族解放一个更有力的援助，同时希望你们要求你们的政府与日本以经济和政治的制裁打击敌人，使中国民族解放早日完成。”

上海文化界在抗战中也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8月19日，郭沫若、巴金等人创办了《抵抗》三日刊，一时间沪上抗日报刊层出不穷，仅画报类就有《抗战画报》等20余种。冼星海、贺绿汀等创作了大量救亡歌曲，其中有救亡歌曲50多首，流行歌曲60多首，旧曲新词30余种，新词小调20多种，随后再请男女明星逐一播唱。10月间，袁牧之等率领13个上海救亡演剧队，奔赴各地抗日战场演出，一时间《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大上海》、《捉汉奸》等宣传剧风靡大江南北，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大创举。

全民抗战的炮声响了，  
我们要放声高歌。  
我们的歌声要高过，  
敌人射出的高炮。  
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  
我们再没有顾虑、逡巡  
要在飞机炸弹之下，  
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

这是当时从日本别妇抛雏返回抗战前线的郭沫若的新作，它表达出的则是无数抗战文艺工作者的心声。

巾帼不让须眉，上海妇女界的姐妹们也起来了。上海劳动妇女战时服务团在女作家胡兰畦的率领下，脱去旗袍，穿上短装，担任起救护、交通、缝纫、洗涤、募捐等工作，她们还奔赴前线宣传抗日。一时间，上海妇女界成立了几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可谓声势浩大之至。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要算何香凝和宋氏三姐妹了。

家家儿女做征衣，  
收复河山定有期。  
众志成城何畏敌，

同心同德励戎衣。

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就大声疾呼抗日救国的何香凝，此时此刻，不但再度赋诗志，而且发起组织了上海妇女界第一个救亡团体“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号召全国妇女姐妹们“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参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而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宋庆龄、宋美龄和宋霭龄此时也屏弃前嫌，团结在了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宋美龄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在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我们要保全国的完整，保护民族的生命，应该尽人人的力量，来抵抗敌人的侵略。”10月23日下午，当宋美龄从南京去上海视察前线途中，她的座车遭到日机的袭击，差点被炸死！原本从不参加民间团体的宋霭龄也担任了一个很不显眼的职务，但却做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工作。作为宋氏三姐妹的大姐，她第一次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炒股票、做投机生意更有意义的事情。而国母宋庆龄则能说会写，在对外宣传上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竭尽全力。10月20日，在隆隆的炮声中，宋庆龄来到美商RCA广播电台用英语发表演说，她那柔中有刚的流利英语带着淞沪抗战的炮声飞越太平洋：“我深信美国对我国争取自由独立的奋斗，必然同情。我们的抗争，不单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护自由民主的人们！”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一普普通通的谚语成了沪上各阶层民众的行为准则。上海滩上的“闻人”杜月笙毛遂自荐担任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主任，他不但自己捐款，而且将自己大达轮船公司的轮船全部征给政府沉于江阴要塞的长江航道，旨在阻塞日军舰艇深入内江。同时，他通过各种途径吁请全市各界捐款，支持淞沪抗战。

银行家、企业家、老板、总裁们行动起来了。镇江盐商李翼如将价值10万元以上的房产全部变卖捐赠，他膝下无子，但是正如他说的：“国就是家，没有国就没有家。”上海纺纱业巨子之一的邵声涛一次捐款5万元，“当此寇深难急，凡属人民，应即牺牲一切，以报国家”，这是他致电蒋介石的电文。法租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明德里的全体住户，从房东到男女佣人，一起慷慨解囊，总捐款620.35元。据调查，捐款5元以下的人家占捐款人家总数的70%，这说明捐款者多系生活中下层的普通民众。对此杜月笙颇为感慨：“民众不富，但爱国热心高涨。”

来自海外华侨的捐款同样慷慨，这是爱国胜过爱家的海外炎黄子孙的一贯立场。南洋巨商胡文虎，以其“虎标”良药风行世界，他嘱咐上海永安堂经理胡桂庚捐赠八卦丹、万金油和头痛粉各50打，以后继续提供。一位名叫郑玉书的菲律宾侨胞认购2万元救国公债，并将自己的轿车转助抗敌后援会使用，他将上海房产每月的3794元房租按月如数交给政府。抗战一日不停，他的捐助就一日不止。仅1个多月的时间，上海市民劝募总队共劝募得救国公债5000多万元，筹募救国捐13.4万元，金银物品14558件，而这在整个捐款数目中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各地的地方军阀部队也杀来了！这虽然与民众抗日略有区别，但考虑到蒋介石嫡系部队和地方实力派部队杂牌军之间的传统宿怨，考虑到杂牌军队中爱国将士的一片救国热诚，也不能不令人感动！桂军来了，川军来了，贵军来了，陕军来了，粤军来了，湘军来了……他们像百川归海，动用各式各样的交通运输工具，甚至步行，朝着一个方向，朝着炮火最激烈的地方潮水般地涌来了。他们的武器虽然很落后，他们的军服虽然破破烂烂，但是他们的精神却是史无前例的高潮。“宁作战死鬼，不当亡国奴”，这是他们的

口号。“失地不复，誓不返川”，这是他们的决心。“胜利归，败则死”，这是他们的遗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过去打的都是极其耻辱的内战，而现在要打的是保土卫国的抗战！“打日本，救中国”，抗日的怒涛正席卷全中国，它是那么的势不可挡！

## 十一、快来分菜，吃饭了

秋风吹来天气凉，难民所内难民寒。  
难民所有好几百，天天日日收不完。  
天天日日收不完，难民心中正盘桓。  
女人成了新寡妇，孩子无爹又无娘。  
孩子无爹又无娘，一样没家没衣裳。  
为国毁家为纾难，国不存来家也亡。

这是流传于淞沪抗战期间上海难民收容所里的“难民谣”，它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上海难民的苦难。而围绕着救济难民，上海各界同样是全力以赴。

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有一下属负责难民收容的救济委员会，其主任委员是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救济委员会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就已经意识到了应付非常时期的难民救济问题，潘公展仗着社会局这块招牌，联合各界成立了这个委员会，下设总务、财务、外事、收容、给养、遣送，训导、医药、纠察和掩埋等组，从这些组的名称就可以了解这一委员会的任务是多么的繁重和紧张了。战前他们准备了 60 多个难民收容所，但仅 8 月 13 日 14 日两天，从外白渡桥上蜂拥而至的难民便占满了这些难民所，有的已经睡在了走廊上。这大概是潘公展始料不及的吧。

于是潘公展又下令公私学校延期开学，腾出大量教室作为收容场所，因战争停业的戏院、影院、舞厅等娱乐场所也派上了同样的用场。上海民间团体、个人乃至国际救济组织也积极参与此事。上海滩“闻人”之一的黄金荣首先让出“大世界”这个全上海最热闹、最宽敞的娱乐场所作为难民的收容地，他还捐钱捐物给难民。上海佛教界领袖人物黄涵之和赵朴初则开创了官民合办难民所的新模式。以“婆心一片”闻名沪上的德国神甫饶家驹发起组织了国际救济会，由挪威总领事奥尔出任会长，也贡献良多。另外还有一些各地同乡会和群众团体也自发组织了难民所。此时，难民收容所已增加到 126 所，收容人数近 10 万！

有了躲风避雨的地方后，千千万万难民的衣食和医药问题便接踵而至，而这一问题比安置更为复杂和耗资巨大。8 月中旬起，上海市府先后拨款 10 万元为救护救济费用，但这无异是杯水车薪，于是一场群众性的募捐活动又开始了。各团体和童子军在街头劝募，同乡会和救济会在报纸上刊载募捐启事，戏剧界为筹募捐款进行大会串。梅兰芳等名角明星到电台播音演唱，想听什么节目，想听哪位演唱，任凭捐款人指各道姓。正是凭借万众一心，以一分一角一元的心意，加上一千一十万的巨额，全上海在短短数月内竟为救济难民筹得了 200 万元巨款！

不少家庭在炮火中妻离子散，救苦救难的慈善团体使用他们开设的佛音电台和航业电台为难民开设特别节目，凡有走失和离散的亲人需要寻找，便可去找这两个电台，它们每天上午 8 时至 9 时，下午 3 时至 4 时专题播送寻人启事，以及有关难民的消息。无形无踪的电波，为战乱中离散的无数家庭创造了破镜重圆的机会。

早已人满为患的难民收容所实在抵挡不住越来越多的难民狂潮，于是大批难民不得不流离街头。这时，一个名为“西联益会”的团体伸出了他们的援手。他们的卡车装上食品，向流浪的难民沿途散发。不久，他们又进行了有益的改进，印制了一种叫做“给养票”的纸券，派人沿途散发给难民们。



一张票可领取 10 件食品，第一批 1 万张给养票不到半天就散发一空。

位于宁波路 540 号的大慈难民收容所是专门收容妇女儿童，它的总管是位 40 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计淑人。这是位热心热肚肠的好人，她一天到晚忙碌着，不是教孩子们识字唱歌，就是照顾病号。她还经常组织大家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说到伤心处她也常陪上一腔伤心泪。饭是慈联会的民生食堂送来的，计淑人总是带头将饭抬到二楼三楼，只见她一边擦汗，一边用勺子敲着木桶，亲切都招呼着：“快来分菜，吃饭了！”等到难民们捧起饭碗，计淑人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往往有饭无菜，大家只好自己掏钱去街上买咸菜，能吃到油炸花生米就算是美餐一顿。为了满足食欲，她们常搞精神会餐，咸菜、油炸花生米便有了极诱人的代名词：“排骨”和“红烧狮子头”。

政府拨款和社会募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难民收容所里又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新工作——“生产自救”活动。法租界里有个康悌难民收容所，收容所工作人员发动大家搞编织和缝纫，难民们上街收破烂，整理出旧衣破布做成拖把。收购来的鸡毛洗净晒干，做成鸡毛掸帚，然后拿到街上去卖。当热心的市民听说这是难民们生产自救的产品，便都乐意出钱购买。与此同时，金城收容所则搞了印刷，大慈收容所进行了编手提袋、草织、制袜、成衣绣花等 11 项生产自救活动。一些有技术和手工艺的难民，收容所帮助他们介绍工作，仅慈善团体的救灾会就介绍出去了 100 多人，这无疑比纯粹接受他人的捐募进了一大步。

但这个数字与几十万难民总数相比，实在是上海中的一滴水，只有将难民们向各地遣送才是根本的出路。这时，上海滩上的又一“闻人”虞洽卿便挺身而出，肩负起了这项重任。身为上海商界巨头的虞洽卿同时兼任上海宁波同乡会委员长一职，这位宁波镇海籍苦孩子出身的“老宁波”深知虽然家乡不富，但毕竟有亲戚邻居，更有浓得化不开的一份乡情，难民们一旦返回故里，总比呆在难民所里苦捱强。于是他一方面疏通工部局的头面人物，一方面致电蒋介石求援，终于使这两方开了绿灯。凡是浙江籍、或转道浙江回邻近省份的上海难民，都可以免费乘坐虞洽卿开办的轮船公司的宁波航班返回老家，同时虞洽卿向他们免费赠送面包、饼干等食品，供途中充饥之用。

还有不少难民最终成为了新四军的一员。我党当时在上海难民收容所里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收容所被称为上海的“解放区”，上海的“延安”。许多难民的爱国热情和阶级觉悟非常高涨，很想去皖南参加新四军。于是经过上海党组织的精心策划和安排，近 3000 多名难民经过千辛万苦的跋涉，最终成了新四军的新鲜血液，其中绝大多数后来都锻炼成为我党的骨干力量，踏上了一条光明的坦途。

## 十二、誓不以厂资敌

淞沪抗战初期，曾有过一次上海部分工厂内迁的活动，这对保存为数不多的中国工业的精华，以贡献与持久抗战，以及给内地工业带去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抗战前夕工业资本总额占全国的 40%，工人数占全国的 43%，产值占全国的 50%，技术工占全国的 40%。上海工业的保存和发展，对持久抗日乃至国计民生的作用自不待言，而如果落入敌手，则无疑使敌人有如虎添翼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早在 1936 年，爱国的经济界人士就提出上海工厂的内迁问题，沉痛呼吁“一·二八上海之役，可为殷鉴”。但是国民政府对此颇为冷淡。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因为并无长期抗战的打算，因此对工厂内迁仍无积极的规划和措施。而此时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则提出了强烈的要求，吁请政府速派员联络，制定计划，并提供迁移费、建厂地皮和厂房等。7 月 22 日，国民政府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28 日资源委员会派员赴沪调查上海各厂现有设备及有无迁移内地的可能。8 月 9 日，资源委员会制定了内迁上海工厂计划。次日行政院通过提案，责成资源委员会等组成监督委员会，严密监督，克日迁移。正当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在沪成立之际，上海也已成为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了！

工厂内迁一开始，许多爱国企业家都积极表示支持，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是要爱国”。化工巨子吴蕴初表示“誓不以厂资敌”，华生电器厂老板叶友才则表示要“置死于度外”。上海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等主要轻工业团体联名呈文，向政府提出具体内迁计划，要求政府予以必要的支持和配合。当 9 月中旬监督委员会提出限制内迁的新办法后，荣宗敬等 32 位上海民族工业界的代表人物立即联名致电行政院，指出政府“全面抗战应有长期计划，以便与敌持久周旋”；以此委婉地提出了批评意见。与此同时，文化界的商务、中华、开明等出版企业等考虑到大后方的教育事业，主动把 500 吨教科书和部分机器内迁。不少企业家不仅带头内迁，而且还四出奔走动员，表现出了中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的高风亮节。

当然，也有一些资本家畏惧内迁的艰险，以“树大难移”为辞推诿不已。有些人对形势估计错误，认为战事马上就会平息，于是丝毫不作迁移准备。而有些厂与外商关系较为密切，他们认为英美势力强大，即便上海失守，日本人仍无法干涉他们在租界内的正常生产。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有些厂在危急时候搬进了租界，甚至连无锡、青岛、江阴、常州等地的一些工厂也特地迁进上海租界以求平安，而有些厂则挂着美、英、法、德等外商招牌，希望这些大国能保证他们渡过难关，一如既往在上海这块宝地上发财再发财。

时至 11 月初上海沦陷，共迁出民营厂 148 家，工人 2100 多名，机器物资 1.24 万余吨。另外，国营江南造船所等也曾迁出一些机器、工具和技术人员。这些工厂的内迁为持久抗战保存了实力，成为大后方工业的主力军。据统计，当时大后方民营工厂生产的军工产品，绝大部分是上海内迁厂生产的。江南造船所内迁人员所建的水雷制造厂提供了大批水雷，有效地阻碍了日军舰艇的活动。这些内迁工厂被誉为“抗战初期厂长与职工为迁移工厂而流洒的血汗所培养出来的花蕾”，“大后方工业生产之洪流”。另外，内迁厂带去的大批技术人才和先进机械，也大大地推动了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这也

是功不可没的。1937年11月，工业家沈鸿带着10多名技术工人和10台机床，来到距离延安70余里的安塞县，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工业的发展；被誉为“边区工业之父”，而沈鸿和这些工人主要来自于内迁到武汉的上海一家利用五金厂。

在内迁过程中，广大工人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往往带着全家与工厂一起内迁，为拖运机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据载，有些工厂的职工不顾危险地抢拆机件，日本飞机来了，就伏在地上躲一躲。日机飞走了，便又站起来再拆，拆好了就扛走。看到前面的伙伴被炸死了，大声喊着“嗷唷”后，洒着眼泪把死尸抬过一边，便咬着牙继续工作。许多冷冰冰的机器上涂染上了热腾腾的鲜血。有时候白天不好工作，便改在夜里开工。此情此景，极为感人。

但是这场内迁只迁出了全市工厂总数的2.7%，这主要是因为国民政府执行片面抗战路线，阻碍了上海工厂内迁的顺利进行。首先，国民政府没有制定周密的计划，拖延误事，丧失时机。南京当局本意只想补助少数将来可制造军火的工厂内迁，对其他工厂的内迁毫无兴趣，因此想方设法地削减或取消各种应该支付的迁移费，甚至警告那些想内迁的工厂不但要自己承担一切迁移费，而且还要承担一切后果。上海资本家内迁的热情因此大受影响，有些甚至由此裹足不前了。此外，由于行动迟缓，缓慢地用木船、小火轮等沿吴淞江至长江运输内迁机件，至使它们最终成为日机轰炸扫射的目标。天原化工厂的部分机器就被炸沉在吴淞江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内迁船只也都遭到炮火轰击而损失惨重。

其次，国民政府官僚机构办事效率低下，还故意设置了种种的磨难。内迁工厂的经费极为困难，搬迁需要的交通工具也要各厂自行解决，政府掌握的大批运输工具只是为官僚机构及其企业服务。最后通行证也极难获取，就算弄到手往往还会被官僚机构仗势从中攫取。然而，即便最终取得通行证也无法保证得以顺利通行，“惟沿途军警机关林立，……故迁移一物势非具备四五道通行证不可”，这是上海市社会局的埋怨，从中可见内迁所受的磨难之一斑。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上海的溃退，内迁更是大受其害。10月28日，天原、天利两厂的内迁船队刚至北新泾，便被国民党军队拦截，充作逃命用的浮桥了事。

第三，国民政府开始规定各厂迁往武汉，而武汉并没有准备好恢复生产必需的能源和原材料，致使许多厂家根本无法立足。即便有些厂历尽艰辛刚准备复工，日军却已兵临城下，结果只能再收拾残局准备二度内迁。各厂在战乱中反复长途迁移，损失更为严重。如大中华橡胶厂到达云南时，内迁物资已损失殆尽；新中工程公司抵达重庆时，2000吨物资只需一辆卡车就能运走了。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致使内迁工厂蒙受了许多不该有的损失，而绝大多数未能内迁的工厂，则成为沦陷后日军侵华的战略物资生产的重要基地。这其中的教训，是不言而喻的。

### 十三、沉默就是容忍日军的暴行

七七事变爆发后，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援助，在实行武装抵抗的同时，不断呼吁世界各国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和平结束战争。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国民政府先后试图求助英美等国出面调停，但由于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方针坚定不移，也由于英美等国远东政策的软弱无能，国民政府的这一努力遭到了失败。从9月起，国民政府又将其外交努力的重点转移到了争取国联和《九国公约》会议制裁日本的侵略，中国代表团在国联揭露了日本的战争罪行，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但在英国的操纵下，国联大会通过的决议没有任何具体援华的措施，也完全不提制裁日本。同时，《九国公约》会议也最终成为英美对日推行绥靖政策的一次会议，它们对日本采取姑息政策，互相推诿，不同意建立共同阵线来制止日本的侵华，这使国民政府求助于国际组织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最后，从1937年10月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和驻日大使狄克逊在中日两国政府之间为“实现和平”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外交活动。然而当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之后，南京政府宣布中日断交，这场历时两个多月的德国调停也以毫无结果而告终了。至此，抗战初期中国政府的外交战便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号。

外交战的不利丝毫没有影响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在他们看来，政府的决策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立场和感情。当“八一三”的自卫枪声传到德国时，《人道报》说：“许多年来我们英勇的中国同志所不倦地呼吁民族精神，统一精神，在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的耸立了起来。”《共和报》载文称：“上海乃世界最富庶城市之一，在日本垂涎已久，在中国必以死力抵御，原属意料中事。观于战况之烈，足见日本获胜之望尚属渺茫……”

在英国，牛津、剑桥等18所大学的90名教授联合致电中国教育部长王世杰，对“日本军队轰炸上海、摧毁学校，吾等闻讯为之发指：吾将敦促本国政府，协力制止日军侵华行动”。英国工会也发表声明，对中国抗战深表同情。10月15日，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蓝博士主持召开“反对日本在华暴行”的万人市民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前国联调查团主席李顿爵士等英国著名人士，英国前任首相劳合·乔治也送来书面发言表示支持。会议开始前日本东京教会曾来电要求大主教不要举办此会，但遭到严辞拒绝。大主教在大会上说道：“这个会的目的，在于反对杀戮和残害非战斗人员，这是今天中国惨痛战争中的一个特点，也使文明世界为之震惊。我们不能沉默，沉默就是容忍日军的暴行！”

美国民众也对上海人民深表同情。美国传教士琼斯博士在给日本国民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认为贵国民众在贵国领袖领导下已误入歧途。中国拒绝贵国侵犯它的主权，各国赞赏中国的立场。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侵略行径的仇恨如火山爆发，这种愤慨情绪将旷日持久，而使贵国蒙害匪浅。”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和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法国著名左翼作家罗曼·罗兰联合发表宣言，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勿与日本合作，“直至日本军队完全退出中国，并放弃侵略政策为止”。此外，德国驻沪总领事和在沪德国商会、印度国民大会、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国

也纷纷声明表示支持中国的淞沪抗战。

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淞沪抗战也给予了热诚的支持，这主要表现在 1937 年 8 月 21 日中苏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表明中苏两国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对于日军的嚣张气焰不失为一沉重打击。另外，苏联还派出空军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战，并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随着抗战的继续，这种友谊的意义就显得更意味深长了。

在沪的国际友人更是直接参与了援助淞沪战争的进程。《大美晚报》主持人高尔德（Randall Gould）便利用其报纸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争，《密勒氏评论报》的主持人鲍威尔（J.B.Powell）更是以他的良心向世人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以致招致日军的极度仇视。有一次，日方派人用报纸包着一枚炸弹向鲍威尔掷来，幸亏炸弹没有爆炸。上海沦陷后，日军冲进租界将鲍威尔逮捕入狱百般折磨，最终使其终身残疾。当采访完淞沪抗战的中期和后期后，早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一举成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便在他的新著《为亚洲而战》中写道：

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在一起了。

#### 十四、脱颖而出 虽败犹荣

“八一三”淞沪抗战虽然最终失利了，但在中国抗战史上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美梦，正如英国《泰晤士报》指出的，上海的抗日部队“脱颖而出，此为近世中之第一次”。它还改变了日军进攻中国的路线，赢得了部分工厂机关内迁的时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勇气，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同时，这次会战标志着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一天终于随之到来了！

